《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九卷第一期，2020年6月：55-66
DOI: 10.6962/MJHSS.202006_9(1).0004

民间历史文献示例

从生命的夹层中挤压出来的记忆 —— 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分类与搜集*

Almost Forgotten Memory—— The Collec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Guangfu Funeral Dirge in Sarikei

汤嵋厢*
（HONG Moi Hiong）

摘要

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新会三江人的挽歌称为“时文”，是随着当年的中国移民流传到泗里街。“时文”有两种类型，即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不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根据内容来看，“时文”有五种样式，即“散锦”“散文”“字眼”“好话”“古人”，各具特色，既可单独而歌，也能互相搭配，反映了它高度的灵活性、包容性。这些时文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也是“哭时文”哭者的歌本。哭者凭借记忆把歌词背下来，经过数十年的洗礼，出口依然能歌。笔者在搜集“时文”方面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在笔录方面也力求精确，多方考究，以求达到方言词与汉语词汇相对应的要求。

关键词：丧葬、挽歌、时文、哭者

Abstract

The dirge of the Guangfu Xinhui (Sanjiang) in Sarikei, Sarawak, is called “Shiwen”, and it was brought along by the Chinese immigrants to Sarikei.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hiwen “, — songs associated closely with funeral ceremonies and songs not associated with funeral ceremonies. Based on the context, “Shiwen” can be categorised into five styles, namely *sanjin*, *sanwen*, *ziyan*, *haohua* and *guren*. Each category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be performed in standalone mode or along with others, hence reflecting the high flexibil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Shiwen”. “Shiwen” is an oral literature that has been transmitted by word of mouth, and it also serves as the song book of the criers of “kushiwen”. The criers recite the lyrics by heart retentively, though vague at times. Tremendous time and

*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考取拉曼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

* 汤嵋厢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拉让校区中文讲师。电邮地址：moihiongh@gmail.com

effort have been put into the collection of “Shiwen” by the author. On top of that, the author strives for accuracy in transcribing and translating the “Shiwe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of Guangfu dialect and Han Chinese vocabulary.

Keywords: funeral, dirge, shiwen, song book, crier

一、前言

本文主要概述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分类与搜集情况。“时文”[2]，指砂拉越泗里街广府人与中国新会三江人在丧葬礼俗上配合丧葬仪式而唱读的广府挽歌，是活着的人对亡魂说的话，主要是以韵文的形式表达；也表示一般人说的话、消息。时文源自中国新会三江一带的农村，当地的人也如此称谓。

虽然时文存在泗里街广府社会已逾百年，但是至今尚未有学者对其做过系统的搜集、整理及分析。为了保存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口头文学，笔者于2011年11月开始至2016年11月，在泗里街走访了12位擅长处理丧葬事宜的女士，并将她们记忆中的时文记录下来。经整理筛选后，共搜集了179首歌词完整的时文。与此同时，为了深入了解时文的精髓，笔者也前后9次到中国新会三江一带农村采集时文，亦共得220首。这些时文，日后可以编拟成册，也可把录音刻录在光盘，方便日后有兴趣进行此研究的学者作为参考之用。

二、泗里街的广府社会

泗里街（Sarikei）是砂拉越（Sarawak）州的第六省，开埠已逾百年，目前所辖县有泗里街、马拉端（Meradong）、如楼（Julau）及巴干（Pakan），管辖总面积4,857平方英里。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泗里街县人口有56,228人，华人最多，伊班人居次。[3]在华人当中，福州籍是最大的族群，其次是广府人，估计有八千至一万人左右，大多数以务农为生，部分从商，年轻一辈中有众多专业人士。[4]华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基督教、佛教、一贯道及民间信仰等。在华人社会，通行的共同语言是华语，家庭母语[5]是各籍贯的方言或华语。

---

2 下文将酌情省略“时文”的引号，写成时文。

3 泗里街华人是21,772人，伊班人是18,559人，马来人是9,192人，马兰诺人是3,933人，非马来西亚人是1,236人，其他土著是594人、其他370人、印度人是116人。2018年7月24日阅自泗里街省公署网页。网址：http://www.sarikei.sarawak.gov.my/page-0-291-161-Demography.html。

4 泗里街广惠肇公会卸任主席冯华海先生接受访谈时如此表示（2013年9月3日）。亦可参阅冯氏于2013年8月5日接受来自广东省江门市广播电视台专访之稿件。

5 在马来西亚，华人热爱华语，维护华教，并把华语定位为“母语”，这是华人热爱民族共通语言的一种情怀。由于华语已经定义为华人的“母语”，为了论述便利，笔者提出“家庭母语”这一概念。所谓“家庭母语”，指的是小孩子一出生即接触的、习得的语言，例如：各种方言、华语、英语、马来语、伊班语，等等。

泗里街的广府人，简称泗广府人，是指泗里街的新会三江人。所谓泗里街新会三江人，是指来自中国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一带农村的移民[6]，以及其土生土长的后人。这些先辈移居的时间较早，大多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会三江人也属于“广府民系”，以粤语为母语。为了准确地说明泗里街广府人所说的方音，本文不以“粤语”或“四邑话”或“新会方言”指称，而说“新会（三江）话”，因为根据了解，“三江话”[7]是当年移民在原乡农村生活时的土话，它基本上跟上述所提及的话音还是有差别的。

泗里街广府社会重视孝道，尤其重视祖宗的祭祀，并且对待父母具有“生前孝敬，死后拜祭”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从“哭时文”的习俗得到体现。“哭时文”是指活着的人通过唱读挽歌“时文”跟亡魂聊天、说话。人们相信为亡者“哭时文”是表示尊重、敬爱亡者的表现，这样亡魂在阴间才不会被其他亡魂欺凌。

泗里街广府丧葬礼俗在各类礼俗中，每一个仪式都有相应的挽歌“时文”，由亡者的女儿、或媳妇、或亲友、或“跟尾的”[8]唉哭[9]。我们通过泗里街广府丧葬礼俗的具体认识，就可以轻易地理解大部分时文的内容，或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它们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时文的内容具体反映了殡葬的过程。

三、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分类

现代哭丧歌也叫挽歌。挽歌产生于春秋时代，是古人在送葬执绋时所唱的歌。《现代汉语》（2014）把挽歌解释为“哀悼死者的歌”（页1340）。

张志诚[10]认为，挽歌可以分成三类，那就是：1、原始的、朴素的、农村的。这是研究挽歌的基础，其文学水平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有些内容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虽然这类挽歌的文字美感不足，但感情是真挚的。2、专家加工的挽歌。有些是读书人加工的，如朱长超的挽歌是以农民的挽歌为依据，加上自己的理解与字词而成；有些是由擅长唱挽歌的老太太在教导别人唱挽歌时加以修改某些字句的。这些加工的要超于原始状态才能臻于最完美的状态。3、类挽歌。指与挽歌相似，且有文字记载的挽歌，由文人所写，但不是用来在现场哭的挽歌，如王守仁写的《瘞旅文》。

---

6 泗广府人的先辈多来自新会三江一带农村，如皮子、沙岗、官田、临潮、步头、洋美、良德冲、新前、禄贤、新村、马泥等乡村。笔者在泗里街广惠肇公会碧山亭（墓园）考察时，发现绝大部分墓碑上所书写的亡者原籍与上述村名相同。

7 下文提及的“三江话”都是指称“新会（三江）话”。

8 “跟尾的”，指整个丧葬仪式的总指挥，她们的工作是主持祭祀、确定仪礼程序、“哭时文”等。她们不是专业户，而是因为熟知丧仪而“好心帮忙”，有时也“好心帮忙开声”，即代替孝眷为亡者“哭时文”。

9 唉哭，指哭者在唱读“时文”时，第一声以“唉”或“唉嗬”开始，接着是称呼亡者，然后才哭第一句，而第一句又以“唉”开始，句中再以“唉”接续，此后每句都以这样的方式来哭。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唉哭”是以平缓的语调、忧伤的语气把歌词唱读出来，即俗称的“哭”。这“哭”不是指哇哇大哭或呜呜哭，而是指“唱读”。广州话“喊”也是指“哭”，因此有人称“哭时文”为“喊时文”。

10 张志诚，上海《殡葬文化研究》特约编辑。采访日期：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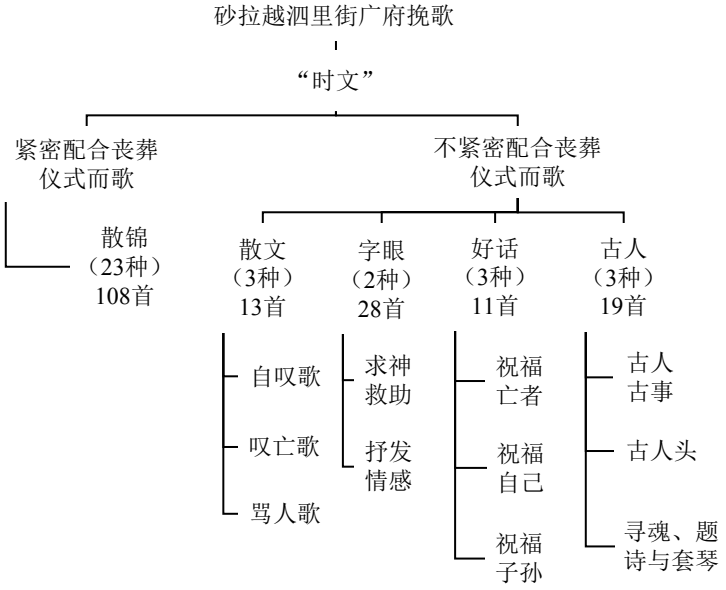
根据实际操作情况与内容而言，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是属于张志诚所提到的第一类，即原始的、朴素的、农村的，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年代久远。这是因为“时文”是农村女性由内心自然发出的歌曲，言辞没有经过艺术加工，自然朴素。从内容来看，大多数都是根据自己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而有所抒发，因此多偏向于叙述殡葬仪式景况；从创作的修饰技巧来看，它注重押韵，并有五言、七言句；从应用来看，它已经不只是在送葬时响起，大多数是在治丧礼俗与服丧礼俗运用。

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与死亡有联系，因此人们不喜欢平白无故地把它拿来作为话题。如果无可避免地提到这种歌，也会以委婉语来称呼，如有人称其为“假姐”、“死人口”、“哭姐歌”、“不三不四的”、“那样的”或“歌仔”[11]，名目繁多，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直白，有的有所避讳，反映一般民众对时文的消极态度。

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可以分成两大类，即“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与“不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如此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仪式在进行的时候，“时文”的主要聆听对象是亡者，“时文”的内容是哭者[12]要向亡者或哭诉或交代或嘱咐某件事，因此关键是“紧密配合”或“不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

下表为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分类表，表内还标示所搜集到的各小类时文的数量。

表1：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分类



[11] “歌仔”，原指儿童唱的歌谣，但是现在也有人用来指称广府挽歌。笔者认为年轻一代的“时文”哭者所哭的时文篇幅短小，内容单一，以及加上避讳心理，所以称“时文”为“歌仔”。

[12] 哭者，指在丧葬仪式上唉哭时文的人。

如上表所述，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的时文只有一种样式，即“散锦”，是对实际仪式的描绘。不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的时文包含四种样式，即“散文”，是哭者情感自由的抒发；“字眼”，是带有祈愿意识的短诗；“好话”，是含有美好愿望的吉祥语；“古人”，是对古代人物事迹与其他事项的述说。各样式又有一些下属类别，可谓品类繁多，各有特色。

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的时文，是指在进行什么仪式就哭什么歌之意。其歌词都含有因应有关丧葬仪式的知识。这些知识有的虽然不很全面，但是能帮助听者加深理解、拓展想象，确保丧葬仪式顺畅、无误，并可加强习俗的传承。例如《整糍》[13]，歌词述及为亡魂制作糕点，所需的材料是粘米粉与糯米粉；所需的人力是亡魂的家属或“跟尾的”；所制作的糍包括“松仔”“高街”“水埕”“水协”，以及未出现在歌词里的扁担、门闩；制作方式是放入镬里蒸熟。这些糍主要是作为亡魂在阴间使用的生活用品，而不是食粮。通过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的时文（“散锦”），我们可以知道仪式所进行的是何事，采用什么祭品，有什么禁忌等。

不紧密配合丧葬仪式而歌的时文，是指仪式停歇之时所哭的歌，内容与仪式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古人”，哭者可以在坐夜（守灵）时唉哭，以消磨时间，或借歌宣泄情感。

有些时文的歌词大同小异，只需要改几个字即可在不同的礼俗唉哭，例如做七的时文，把《头七》的歌词更换几个字就成为新的时文《四七》或《尾七》，在四七和尾七的祭拜仪式上唉哭；安葬礼俗的《揦饭》（地罗）改几个字也适合在服丧礼俗的百日、上冬的揦饭时唉哭，这是因为所需的祭品相同，想说的话一致之故。

综合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特色来看，它可分成语言特色与内容特色。语言特色包括注重诗体形式、歌词结构与押韵；必须以“唉”起调，间中加称呼与衬字、叹词；具有新会（三江）话的语音特点；仍保留较多的单音字古汉语词；方言俗语具浓厚的地方风味；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内容特色包括家庭层面的魂影敬重—“知会亡魂”性质较强；祭祀层面的仪礼知识传承—描写仪式情状为中心题材；文化层面的民俗事象繁盛—古今兼具；心理层面的平和展现—接受与祈愿。

四、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搜集

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搜集整理工作，尽量贯彻“全面搜集”、“忠实记录”和“慎重整理”这三大原则。“全面搜集”要求搜集的作品在时代上、地区上、内容上、体裁上都要有所不同的涵盖，不能单一，就连“对某一种作品的各种不同的说法（异文）都要进行记录。”（段宝林1998：277-278）“忠实记录”要求根据不同的作品（韵文作品和散文作品）、作品的语言艺术风格等“一字不动地记录下来”

[13] 朱多（1935-2015）嗡（口述）。采录日期：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泗里街。《整糍》：一脚躐落沙仔地，二脚躐上碓舂糍；一脚躐落沙仔墩，二脚躐上碓舂粉。上顶青天三块瓦，上重箩筢下重纱；上顶青天三块葵，上重箩筢下重糍。镬铲煮糊糊起路，仔娘整糍长福寿；镬铲煮糊糊起油，婶母整糍永无忧。开手整糍整松仔，中间整出花楼台；开手整糍整高街，水埕水协整到齐。一个水埕四个耳，得来挑水洗罗衣；一个水协一个盖，得来装水洗罗帷。揽草入房随地拱，灶前烧火炊高松；揽草入房随地拖，灶前烧火炊馍馍。

（段宝林1998：279），同时在记录的当时还要了解作品的流传和搜集情况，例如记录地点、记录时间、提供者的材料、提供者的家谱等等，以便了解作品源流和文学发展。“慎重整理”要求在基础原料上“进一步进行慎重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恢复劳动人民创作的本来面目，然后再大量印行。”（段宝林1998：284）

时文的搜集方法以田野工作为主，在进行记录、整理、分类、归纳、筛选和分析后，找出具有典型性的作品，用以进行比较。田野工作的范围主要是到实地采访时文哭者；搜集时文手抄本、录音卡带；实地观察丧葬仪式的进行、摄录挽歌“时文”的实际应用（“哭时文”），然后把语音材料变成文字档案。以下为具体的搜集方法：

（1）实地采访时文哭者。时文的获得主要是通过走访时文哭者，让她们根据记忆说出歌词，笔者录音或录像后笔录。在砂拉越，笔者搜集了12位哭者的时文，共计179首。[14]她们是林齐（3首）、林琼花（24首）、翁妙合（28首）、朱多（14首）、梁合（48首）、梁财利（11首）、林月琴（8首）、鲁美莲（17首）、陈顺彩（9首）、杨稳（2首）、陈用（10首）和陈如意（5首），并深入访谈10位哭者学习时文的历程。[15]她们有的在采访期间口述时文，有的在实际仪式上“哭时文”。她们的年龄，最年长的是90多岁，最年轻的是60多岁；有的是中国移民，有的是土生土长的第一、二代华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跟老移民学习，或是在听别人“哭时文”时死记硬背下来。

在采录期间，笔者采用录音、录像与笔记同时进行的方式，有时还会让她们口述同一首时文两三遍，或者相隔一段时间后重新口述，以确认她们所口述的时文没有丢失词句。对于语音不详的字词，也会要求她们重复数遍；对于含义模糊的字词，也会给她们提示，或让他们形容与叙述相关事项。因此，老人家有时候会说：“一下游不出来了”，表示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在采录期间，也有哭者不接受笔者的录音与拍照。她们认为把时文录下来，一旦再次播放时就会引来亡魂的纠缠，对哭者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只能采用边听边逐字记录的方式记录。

（2）搜集时文手抄本、录音卡带。由于时文是凭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一旦忘词，就需靠个人的语文素养来填字加词。有些人为求方便学习与记忆，就会把歌词抄录下来，编写成一本供个人使用的歌本，如鲁美莲所提供的时文，就是根据她在1983年时留下的手抄本口述。她所提供的17首时文，有些字词与中国早期的时文手抄本所出现的字词相同。

除了以文字记载时文，还有人以录音卡带保留录音，待晚间休息时播放，边听边记。录音卡带虽是一种很好的记录方式，可是科技日新月异，20多年前的产品在现今

---

[14] 笔者在泗里街共搜集了195首时文，其中179首时文，既有歌名又有歌词，列入《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歌名列表》内。在新会搜集了270首，有220首的歌名列入《中国新会挽歌“时文”歌名列表》，以供分析、鉴赏、收藏。那些没有列入表内的时文，是因为从村民处复印来的，或者从新会地摊上购买回来的时文手抄本，它们有的页面破损导致歌词有欠缺，有的白字太多无法辨识相关字词，有的语无伦次难以理解，因此割爱。那些以录音形式搜集的时文，因为录音品质欠佳，例如声量太小、噪音干扰、遗漏前后歌词等，导致无法笔录歌词，也无奈淘汰。

[15] 请参阅附录1：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提供者简介。笔者亦曾在新会收集13位哭者的时文，她们是珠兰、梁秀凤、容顺蓬、徐银香、鲁娇、叶琴意、李养舸、陈方、区大、区莲爱、马满群、吴惠英，以及恩平的银合意。

社会已成为稀品。梁财利就是以这种方式学习。2012年4月7日笔者采访梁财利时，她搬出家里的4张卡带，但都已经无法播放。她说不记得是谁人所唱，何年所录。根据梁财利的说辞，她曾经为父亲行七而找李维字（译音）的妻子教时文，她母亲病危，她又跟人学习，两次都以录音卡带记录以便回家后聆听。为了聆听录音内容与求证录音年份，笔者把卡带交给专人处理，其中的一片能够还原。笔者把还原的录音卡带播放给林琼花听，林琼花一听即认出是自己的声音，并且忆起曾经在晒可可的棚架下录音。笔者就此事再度询问梁财利，梁也认同是林所口述。后经多方查证，确认梁财利的父亲于1981年去世，母亲是1987年离世。林琼花说她的丈夫去世后（1981）才学时文，因此笔者推论这个录音是在1987年所录，因为当时林琼花已经很擅长“哭时文”

（3）实地观察丧葬仪式的进行、摄录挽歌“时文”的实际应用（“哭时文”）。泗里街广府丧葬礼俗可归纳成四个礼俗。第一个礼俗与初丧有联系，因此称亡者停灵时段为治丧礼俗；第二个礼俗与安置遗体有关系，因此称这段从准备出殡到下葬前后时段为安葬礼俗；葬后的各个祭祀时段，称为服丧礼俗，以及亡者入土为安以后，家属为了表示悼念、追思及妥善处理遗骸的“后丧葬”礼俗。

泗里街广府丧事繁琐复杂，禁忌多且细；耗时长、费用高；有些用语独特，只能在丧葬事项上使用，也不能望文生义。例如民俗词语“引袋”，指的是一个大小中等的白色布袋，里面装满金银纸（称为“挽手钱”），让亡者的手挽住，摆在遗体上，一般相信这样亡者在路上才有钱消费。如果没有亲眼目睹仪式的进行，以及看到相关用品，可能会误会亡者遗体腹部肿胀，因为在“引袋“上还要再铺上一层被单，不明就理的人就会心存疑虑。

为了加深了解时文的内容、用语的确实含义，笔者也在征得丧家的同意下，在国内实地观察了34场丧葬仪式（其中两场是在商业化的殡仪馆）[16]，搜集在实际场合运用的时文。笔者发现在丧葬礼俗上有“哭时文”的仪式共有14场，说明“哭时文”是备受泗里街广府人重视的习俗，“时文”的采用记录依然频繁。[17]笔者在实地观察丧葬仪式进行的地区是砂拉越泗里街县广府人居住的“港门”，如基塞坡、基笠、双溪老塞坡、民那坡、牙仑、泗铎、巴都、玛旺、孟米，以及巴干县。[18]这些“港门”都是当年先辈开荒之地，保留较传统的习俗。

（4）使用观察日志记录所闻。在田野工作期间，笔者也以书写日志作为一种记录重要的事件、想法和感受的手段。通过日志，可以加强记忆，重临观察情境，帮助分析仪式的实践，以及查验时文中某些词句的含义。以下为2014年6月8日观察日志举例：

---

16 在中国则是14场，有8场是有人“哭时文”的。

17 泗里街广府丧葬礼俗共有103个丧葬仪式，当中有哭者在场“哭时文”的仪式有45个（有10个仪式的做法相同而时文内容稍有变化），占了所有仪式的43.68%。

18 笔者也走访中国新会区三江镇内小巷的某些住户（小巷称为“里”），以及其邻近一带农村，如沙岗、临潮、良德冲、沙拉坑、洋美、官田、茶坑、袁家村及邻近小镇如杜阮、古井等等。笔者还走访了开平、恩平、鹤山，台山，以及到上海南汇新港书院镇观察了一个三七葬山的仪式。以下是笔者在中国新会进行田调的日期：（1）11-15/6/2012（2）7-22/12/2012（3）5-16/6/2013（4）24/11-14/12/2013（5）29/3-6/4/2014（6）28/5-17/6/2014（7）15-28/12/2014（8）5-12/11/2015（9）3-10/12/2015，累积田调天数为111天。

> “在恩平，婵姑（“婵姑饭店”老板娘）告诉我她小时候听人哭丧歌，很快就记得，现在不大记得了。目前，五、六十岁的妇人还会哭丧歌，市场里的妇人多数也会。她的谈话可以参考。她说批发街有人卖录音卡带和时文手抄本。过后我和雅结（表侄女）走去市场，我看到一位正在切头菜的老太太，跟她聊天，并绕弯子问她会不会唱儿歌，歌仔，她直接问我是不是哭爸爸妈妈的那种歌，然后就唱了起来。我马上录音。过后，也许是我看起来不明白她唱什么，所以她就说没力气，就不唱了。老太太八十八岁，瘦小，看起来很善良，年纪也真的很大了。她自称姓吴，在市场做生意已经有几十年。在她的指点下，我们走路去批发街，来到一间贩卖金银纸的商店向商家询问。老板娘拿出6个录音卡带，说一个卡带卖人民币30元，如果录音不好，可以拿回去换。后来问她拿手抄本，她拿出一叠油印本，封面题‘福寿双全’她说共有四集，缺少第三集，就拿一本封面题字为“散锦”的给我，说一本卖3元。这些宝贝，共用了我人民币200元。”

根据这个记录，笔者后来就知道寻找时文的门路，那就是到贩卖金银纸的店铺咨询，因为时文是为死亡服务的，人们会购买录音卡带或文本回去学习；也知道恩平还有很多人会哭丧歌，可以到当地采风。

（5）把语音材料变成文字档案。泗里街的广府人主要是以聚方言而居[19]的方式生活在农村，在语言使用方面，中、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传统的广府方言。这里所谓的“传统广府方言”指的是三江话，在他们的日常用语里，仍然会出现一些相当古老的俗语、方音俚语，[20]听着就感到很鲜活。由于访谈都是以三江话为媒介语，访问对象也是以三江话口述时文，为保留受访者真实的言语、语气，因此以方言笔录，之后再翻译成华语。

笔者在笔录时文时，遇到不同的语音现象就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一般情况，是采用汉字作为书面记录手段，尽量保留原来的三江话的词汇，并在脚注加以释义。保留方言词汇的意义重大，这是因为“民歌和方言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但体现在歌词上，而且体现在音调上”（周振鹤、游汝杰2006：173）。

遇到时文中难以找到相应的汉字来做记录时，笔者就会考证词源或本字以找出最恰当的意思。例如一个“煠”字，笔者就花了4个小时来查找辞典，反复比较最能反映广府人所指的“把东西放在水里煮熟”的意思。笔者根据“煠”字的意思来判断，认为“煠”字更传神，因此以烹煮食物的方式决定用“煠”（新会方言[sàb9]，《广韵》士洽切）字来指称，如“煠白斩鸡”、“煠猪糁”（用水煮猪的食物，一般是芋叶芋茎）、“煠蜀米”（用水煮玉蜀黍）等，而不是如《广州话正音字典》借“熠”字表示。另一个例子就是“劏”字。“劏”字基本解释为“割”，笔者以此字替代三

---

19 “聚方言而居”，指的是同一方言的族群，聚居在同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所形成的村庄，俗称“港门”。

20 例如“吊脚公”（生日）、“悉皆烹”（吓唬人的话）、“冇流啦”（不靠谱）、“起市”（骄傲）、“沙尘”（骄傲）、“焗蕉”（置身于封闭闷热的环境）、“心气”（高兴、开心）、“过水”（给钱）、“损口”（伤口）等等，多不胜数。

江话的“lai”音（与三江话的“礼”字同音），表示以刀具割下的“一条”，作为量词“条”之用。如“一劗猪肉”。

此外，有的三江话有音无字，只好采用意思较为接近或相同的汉字替代，例如三江话音“nak”含有“藏起来不让人发现”的意思，就用意思表示“隐藏、躲藏”的“匿”字来充当。这是从汉字本身的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来确定其“代表性”的。那些实在难以用汉字替代，就用标音方式，如“mei埋”的“mei”（mei，有音无字），指离世，委婉语，以及那些语助词，就直接用罗马拼音，如“ko”。这些都是生动的、新鲜的、具有特色的三江话口头语言，因此尽量忠实地记录下来。

（6）以三角测量法[21]确保资料的可信性。由于本研究的挽歌“时文”是尚待开发的领域，在很多方面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有很多概念、词语运用、词义理解等都必须再三确认，因此采用三角测量法以确保资料的可信性。笔者在遇到一些较为复杂的现象、词语、年份的时候，会采用不同的管道多方搜集资料以及向多人求证以求真实可靠。例如时文《整糍》中提及的“松仔”和“高街”，为了具体说明其作用，笔者咨询多位哭者的意见，最后敲定“松仔”是“供亡者在阴间登上阳间的梯阶，其表面上的花纹是梯级，方便攀登”；“高街”是“供亡者到了阳间后，顺着它光滑的表面滑到挂在墙上的旌再滑下来人间，以便坐在其灵椅上接受供养”。资料的可信度高，才能正确表达含义。

五、结语

口头文学无所不在，但是也最容易被人忽略。如果说口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的工作很艰难，例如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的搜集与整理，那么最艰难的地方就是把语音转换成文字的过程。绝大多数的口头文学都是以本族语流传于世，因此在面对汉字与方言词对应的时候，除了要多方追究字源本意，也要考究其含义与汉字的选择，以免出现错误。这不但说明口头文学的搜集工作必须有深厚的方言文化底蕴，以及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同时也反映一个事实：方言在流失的同时，口头文学也随着流失。本文的副标题“从生命的夹层中挤压出来的记忆”就是说明口头文学的珍贵之处，那是老人穷其一生都怀揣于心的作品，在生命的尾声，因缘聚合，迸发而出。通过了解老人的生活痕迹、个性与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口头文学不惧于岁月的流逝而苟存于世的原因。期许我国各族群都能重视口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丰富民间文学的积累；因为它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因此必须加以搜集和传承。

参考资料

段宝林，1998，《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杰夫·米尔斯（Geoffrey E.Mills）著；王本陆、潘新民等译，2010，《教师行动研究指南》（3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周振鹤、游汝杰，2006，《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三角测量法，指用各种方法采集数据，而不是单靠单一的一种数据。（杰夫·米尔斯2010：62）。

附录

附录1：泗里街广府挽歌“时文”提供者简介

1、**林齐**（1922-2015）原籍广东新会临潮人氏，1928年从中国随母亲前来，其父比他们早到泗里街种植胡椒多年。他们一来到就种稻米，也和人家做一点散工。林齐小的时候经常跟老一辈的中国移民混在一起玩儿，出嫁后也经常和一些老人家来往，所以对于丧仪不陌生，也学了不少时文、儿歌等。她跟着老婆婆去做事干，才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传统的丧仪。林齐虽然年逾九十高龄，但是精神愉悦，笑声爽朗，身体也很好。她本着存好心做好事的心态替人做事干，即使三个晚上不睡觉也不觉得劳累。

2、**林琼花**（1934-2015）出生于泗里街玛旺坡，她的父母为中国新会移民，她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华人。她年纪很小就以种植水稻、胡椒，替人割胶等劳作帮补家计。她不曾上过一天学，但是胆识过人、记忆过人、勤奋过人，曾多次只身到国外省亲，对时文“过耳不忘”。林琼花大约七八岁时就跟来自中国的阿姨、妗母等在胡椒园里边工作边唱“嫁女口”（女子出嫁时唱读的出嫁歌），很是热闹。她是在中年时夫婿病逝后才学习“哭时文”。林琼花替人做事干，也从来没有先议定价钱，都是由主家自由包利是，非常大方、慷慨。

3、**翁妙合**（1932-2016）祖父母是中国新会移民，她是第二代华人，在双溪鲁塞出生。翁妙合很小的时候就去跟其他女孩子玩，学唱“嫁女口”。后来随父母搬到基塞后认识一班女性朋友，以及一些来自中国的老人家，因此也经常去“女仔屋”（独居中国老太太的家，家里因常招待女孩子而得名）玩。四十多年前，当翁妙合家翁去世时，她才真正开始学“哭时文”。她的记忆力超强，能牢记很多自己曾经用过的时文。她的“古人”《武吉卖柴》很有传统歌谣的味道。在平日的谈话里，她也喜欢穿插一些时文或格言、谚语。

4、**朱多**（1936-2015）父母亲都是在1930年代从中国新会前来泗里街定居。朱多以前经常跟着南呒佬李安帮助人处理丧事，后来广府人对红白事的处理方式有疑问也会来咨询她的意见。她当年学习“哭时文”是因为当时办丧事兴“哭时文”，丧府知道她会一些时文就去找她帮声。为了能有更好的表现，于是她就去跟那些会“哭时文”的老人家学习，并把各种时文抄写进簿子里。朱多一生为人勤俭、善良、机智多才。她凭着自己敏捷的思维与坚定的意志力克服各种困难。

5、**梁合**（1933-2019）在泗里街芽兰坡长大。她个性开朗、乐观、待人友善。她小时候要到胡椒园工作，没有机会上学，有时站在课室外面看人读书，心里就很羡慕。她的记忆力非常好，只要听一次别人“哭时文”就能熟记，并且会调换增删字句。梁合还会吟唱儿歌、洗口角、猜谜等。她有一首生活歌，叫《十个哥哥养个妹》，内容丰富、精彩，后来收录在林福杰写的《一首歌谣记载了旧日嫁妆风俗》。她“哭时文”的声音婉转动听，不急不徐，调子转得自然有韵味，听了顺耳。她对“哭时文”的信心与兴趣非常浓厚。

6、**梁财利**（1934-）出生于泗里街孟买坡，父母为中国移民，有十个兄弟姐妹。她出生时家境不错，母亲还有钱寄回去中国给祖母帮补家用。梁财利小时候没机会读书。学校创建后，父母只让20来岁的哥哥去上学。因为种了几千来株胡椒，她们姐妹就要留在家里“企园口”（打理椒园）、割胶、种稻等，净做农活。她在1981年才学时文，主要目的就是在父亲做百日时行七唉哭。梁财利认为行七“哭时文”是表示尊重亡者，也是因为有人“哭时文”，亡者听到声音才会跟着回到家里，那些烧给他的东西，或是煮给他吃的东西，他才能获得。

7、**林月琴**（1936-2020）林琼花的妹妹，出生与婚后的居住地都是泗里街玛旺坡。她大约六七岁时就跟着她的舅母学“嫁女口”，其音调、唱腔、起式等都与“哭时文”相似，因此她到了十多岁学时文也就不觉得有困难。她喜欢倾听别人“哭时文”，往往能听出时文中遣词用字的差异。虽然林月琴会“哭时文”，但是不曾去当“跟尾的”帮人做事干，也不曾代替别人的女儿行七。几十年前，她曾经在她姐夫、姨丈、姨母的丧礼上“哭时文”。近年，

她偶而会在亲友的丧葬仪式上“哭时文”。她的记忆力也很好，讲起往事就像讲故事一般动听。

8、**鲁美莲**（1945-）祖籍中国新会三江镇新马单，在泗里街民那坡长大。她十四岁上学，读了三年书，是民那小学于1959年开创后的应届生。1983年，其夫病逝，她才学习“哭时文”。她说当年是先把老人家口述的时文录下来，接着在播放聆听时逐句抄写下来后加以梳理，好让时文听起来更加通顺，然后在胡椒园工作时心诵，直到熟记为止。在遇到不会写的方言词时，她会多听几遍，努力记住是什么字音，或是找相近字音的字词来替代。鲁美莲认为给老人家办服丧礼俗是表示后辈对前辈的敬重与感恩，而当日除服是“一阵风”的孝（孝顺）。

9、**陈顺彩**（1926-）中国新会良德冲出生，她的父母曾在泗里街种植胡椒，也开过杂货店，后来返国。她二十五岁时从中国乘坐船只到香港，后来一心要到泗里街种植胡椒，因此就让亲戚陈高明办理手续南来。陈顺彩小时候家境富裕，因此有机会上学，以及有闲暇跟老人家学习各种歌谣，包括儿歌、哭丧歌，以及拜神、请神歌等等。她所提供的儿歌当中，以《鸡相打》最为有趣，她在吟唱的时候也陶醉在其中。她的时文是在中国学习的，来到这里很久没有用过，所以遗忘了很多。她对丧仪、丧事禁忌等都有一定的认识。

10、**杨稳**（1930-2017）中国新会睦洲出生，六个月大的时候由母亲抱来民丹莪与父亲相聚。她小的时候经常与来自中国的老人家在一起，并跟她们学习时文、嫁女口、儿歌等。她在闲暇时也常吟唱一些她喜欢的歌谣。杨稳在年轻的时候，港门里有老人家去世，她都会去帮忙，也会帮声“哭时文”，但是在平日里她不唉哭时文，也不谈论，因为有所避讳。她除了帮忙处理老人后事，也曾经去临终关怀，白天工作，晚上熬夜陪伴病重的老人，非常热心、勤快。